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经验研究

刘海英,张纯洪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在体制内利益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二是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关键词: 经济增长;非国有化;质量;数量

中图分类号: F224.0;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07)02-0034-06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国内外关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有经济部分效率低下,而非国有经济部分(Nonstate Sector)的效率相对较高。比如 Lin(1996)^[1]和 Zhang(1997)^[2]的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SOEs)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Jefferson, Rawski & Zheng(1996)^[3],Jefferson, Rawski, Wang & Zheng(2000)^[4],Laurenceson & Chai(2000)^[5],Zhang, Zhang & Zhao(2001)^[6],Carsten(2002)^[7]以及 Zhang, Zhang & Zhao(2002)^[8]等通过对比 SOEs 和非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率后得出,后者具有更好的盈利能力和更高的效率,并且在统计意义上得出,管理激励因素导致了非国有化经济的效率较高。Wei, Varela & Hassan(2002)^[9]的研究扩大了样本范围,选取了中国 1036 家不同所有制企业做绩效差异评估,得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非国有企

业^①。而 Phillips & Shen(2005)^[10]则从宏观角度研究非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包含了国有经济份额等因素的回归模型中,发现国企比重和区域经济增长率强负相关,国有经济所占份额下降 10%,第二年的实际 GDP 增长 0.7%—1.2%。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不需要通过经济非国有化来实现。Dollar(1990)^[11],Gordon & Li(1995)^[12],Stiglitz(1994)^[13]以及 Aivazian, Ge & Qiu(2005)^[14]等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对于中国来说,非国有化并不是提高效率的必要前提。丁冰(1996)^[15]、张克难(1997)^[16]和刘元春(2001)^[17]等学者研究认为,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并不一致,简单的资本非国有化改革在过去有弱化我国规模经济以及资本产出效率的作用。

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非国有化改革效应展开的。或者将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制度

收稿日期:2007-02-27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985 工程”项目“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985CXJD01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60390270);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05QN031)

作者简介:刘海英(1972-),男,吉林松原人,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张纯洪(1978-),女,吉林大学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理论研究。

变量,研究其对微观企业效率或宏观经济增长(GDP)的促进作用。然而,高质量经济增长本身体现了经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有机统一。基于此,本文将从宏观角度,通过动态计量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三者经验关系所形成的机理。

二、非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 VEC^[18]模型系统

(一)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VAR 模型系统需要三个表征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变量序列。其中,反映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用历年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百分比 F 来表征;反映经济增长数量的变量用按 1978 年不变价(1978=1)计算的历年经济增长指数 Y 来表征,这两个指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及相关计算;^②而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量则用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的因子得分值 Q 来表征。^③

(二)VAR 模型系统变量的选择

在平稳性检验之前,为了避免序列的剧烈波动,对上述三个变量作对数化处理。由于变量 F 和 Y 的数据直接来源于历年统计年鉴或者计算所得,而变量指标 Q 出现负值,因此只对 F 和 Y 分别作对数化处理,形成新的序列并记为 Q、LF 和 LY。下面分别采用 ADF 和 KPSS 两种检验变量序列平稳性的方法,两种检验结果都表明,序列 Q 的一阶差分 D(Q)在 1%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为序列 Q 为一阶单整,即 Q~I(1)。在 ADF 检验的结论下,序列 LF 和 LY 的一阶差分序列 D(LF)和 D(LY)在 5%显著性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然而在 KPSS 检验条件下,却不能在该水平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KPSS 平稳性检验拒绝单位根的势(Power)相对更强,因此接受 KPSS 检验结论。这样 LF 和 LY 的二阶差分序列 D(LF, 2)和 D(LY, 2)在 1%显著性水平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为反映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序列 LF 和反映经济增长数量的序列 LY 同为二阶单整(LF~I(2), LY~I(2)),则 D(LF)~I(1), D(LY)~I(1)。根据 VAR 建模要求,选择序列 Q、LF 的一阶差分序列 D(LF)和 LY 的一阶差分序列 D(LY)作为 VAR 系统的三个内生变量,分别代表转轨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数量变化的三个指标。

(三)基于多变量协整关系的 VEC 模型建立

首先利用 EVIEWS5.0 软件生成一个 VAR 对象,内生变量输入顺序为 Q、D(LF)和 D(LY),依据 AIC 和 SC 信息量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经过测试,当滞后期 P=1 时,AIC 和 SC 信息量同时达到了最小。然后按照 Johansen(1995)^[19]提出的关于压缩(系数)矩阵协整似然比(LR)的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VAR 系统中的变量间仅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不存在过渡识别问题,因此不需要施加经验约束。进一步,令协整方程:

$$VECM=Q+24.13178D(LF)-48.80786D(LY)+3.307862 \quad (1)$$

对序列进行 ADF 和 KPSS 平稳性检验,发现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进一步验证了所建立的 VAR 模型变量间协整关系正确性。

至此,得到基于多变量协整关系的 VEC 模型,如(2)式所示:

$$\begin{bmatrix} D(Q)_t \\ D(LF,2)_t \\ D(LY,2)_t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10654 \\ -0.048181^{**} \\ -0.001856 \end{bmatrix} \times VECM_{t-1} + \begin{bmatrix} 0.05880 \\ 0.00284 \\ 0.000847 \end{bmatrix} \quad (2)$$

另外,观察所建立的 VEC 模型调整参数矩阵 α 的各个元素: $\alpha_{11}>0$,虽然不满足 Wiczens(1996)^[20]提出的 VEC 模型所具有的负反馈机制,但应该看到, α_{11} 的系数估计并不显著,因此模型不受其影响;同样 α_{31} 的系数估计也不显著;只有 $\alpha_{21}=-0.048181^{**}<0$,其系数估计显著,这说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变化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机制调整产生效果。

三、相关检验及实证研究结论

进一步对协整方程中变量 Q 与 LF 作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不能得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因果关系,因此,基于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无法证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同时,对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等同于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检验。弱外生性检验也表明,存在着 D(LF)到 Q 的负向因果关系。可以证明中国非国

有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同理,对协整方程中另一个变量 $D(LY)$ 作相同检验表明,不存在着 $D(LY)$ 到 Q 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中国经济规模(数量)的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在统计意义上无因果联系,即转轨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没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这种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不同步性进一步说明转轨以来中国仍然处于粗放型、低质量的增长模式之中。

另外,改变系统内的变量次序为 $D(LY)$ 、 $D(LF)$ 和 Q ,重新建立 VEC 系统。重新对变量进行弱外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存在着 $D(LF)$ 到 $D(LY)$ 的正向因果关系,可以证明,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规模)的扩张。

至此,基于 VEC 模型分析框架下,得出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三者经验关系的结论如下:

1. 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规模)的扩张。

2. 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改善)。

3. 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没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

四、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反向作用机理

(一)非国有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数量扩张的机制

从经济制度供给上看,中国经济通过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产权制度创新,产权制度创新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及企业组织的变化,从而促成了市场制度、企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变迁,活跃了经济系统内部的增长机制,使要素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提升了经济的内在效率,实现了经济帕雷托式的“增量”增长,最终使得经济规模不断增长。

从微观企业上看,中国经济非国有化进程体现了国有企业产出比重的相对下降和非国有企业比重的不断上升。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存在产权模糊、委托代理过程复杂(压力传导机制不畅)、缺乏对内部人的有效监督等问题。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产权更加明晰,大幅度减少了代理成本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这些因素使得非国有企业效率相对较

高,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而企业盈利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而这正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规模扩张的微观机理。

(二)非国有经济抑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原因

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根源在于微观层次上的非国有企业经营行为。中国非国有企业主要包括内资民营企业 and 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包括合资和独资,以下简称外企),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没能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原因有两点:

1. 中国民营企业相对低水平的创新能力,导致了其对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不高。由于在融资上不如国有企业,在政策上又劣于有外资背景的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资本的缺乏导致其不愿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因而通常会选择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另外,合理内部激励机制的缺乏、僵化的一元化产权模式以及无法彻底根除的家族化管理模式,使得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创新能力弱化。例如,珠三角、长三角一带曾经是中国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然而目前,如果排除掉有国企转制背景的民营企业,其中大多数民营企业因缺乏创新机制而丧失了持续增长的能力,已经或正在退出市场。这种创新能力不足注定了民营企业不大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由“广义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高质量经济增长。

2.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数是以资源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不可否认转轨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但由于一些政策失误和有效监管的缺失,中国民营企业在无社会责任约束前提下坚持利润至上为其唯一诉求。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大多主张“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甚至采取不正当的经济手段违法经营以求暴利,私自开采使用国家的有限资源、偷排偷放污染物等等。虽然企业自身成长壮大了,但从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来看,这种行为不仅加重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加速了资源的枯竭。单从这一点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确实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中环境因子的改善。

与民营企业一样,转轨以来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也不可忽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事实表明,外资企业在“利益最大化”和“税收最小化”的目的驱使下,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预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

1. 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不明显。中国吸引外资企业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此,中国引进外资时给予了其特殊的优惠税收政策,希望能通过“市场换技术”等手段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内涵型增长。然而,外企所看重的是中国的税收优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不尽完善的自然资源 and 环境保护等相关法规,而绝不是将先进技术移植到中国培养自己的竞争对手。即使其投资了一部分高科技产业,但由于其严格保守核心技术,导致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于俊艳(2005)^[21]的实证研究表明,FDI 为了维持技术上的垄断地位提高了新技术进入的成本,使中国的技术被锁定在低水平的陷阱中。因此可以说,外企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预期的技术进步效应。另外,从产业分布可以看出,FDI 对外输出的项目很多都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特性,^④这又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同样,外企所带来的管理知识溢出效应也不明显。袁诚、陆挺(2005)^[22]从民营企业家的外企经历这一视角对 FDI 管理知识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三资”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带给民营企业家某些而不是全面的先进管理理念;在企业业绩的最终表现上,FDI 对中国企业家有一定的培训效果,但并不显著。刘海英等(2004)^[23]研究表明,由人力资本分配不均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积累不足,是导致中国“市场换技术”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赖明勇等(2005a,b)^{[24][25]}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是技术外溢的最主要因素。这已经充分说明,引进外资企业并没有达到技术和管理创新扩散的预期效果。

2. 加工贸易中的转移定价所导致的税收流失日趋严重。2004 年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就已经达到 55.3%,其中绝大部分为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表面上加工贸易出口繁荣了中国经济,但是在加工贸易过程中,外资企业完全掌握市场和渠道,严密控制关键技术,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大多在国外进行,中方只负责简单的加工装配环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利用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不仅加工所需的上游原材料直接进口,对国内原材料产业并没有形成有

效需求,而且大多通过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子公司,使中国经济的税收大量流失。可见,虽然外资企业通过大量出口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对内不能通过有效需求促进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外由于不能获得利润而使中国经济因税收流失而加大了经济增长成本。因此,外资企业通过这种“大进大出”加工贸易经济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表面上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无论从其所带动的技术进步还是从其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利润来考察,外资企业确实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五、研究启示及政策建议

转轨以来近三十年,随着中国非国有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张,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并没有获得同比改善。尤其在近年来,投资过热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低水平扩张,由此引致的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等均有明显增加趋势,在此背景下,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就已经暗示中国经济不能只关注量的增长,还应注重质的改善。

本文的研究无意否定中国经济非国有化改革的政策问题,这是因为,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宏观历史数据的统计推断得出,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本文对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的涵盖范围可能不够全面(比如缺少反映就业和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⑤),如果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未必如此。其次,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是质量改善的物质基础,因此,不能直接否定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佳的原因是复杂的,并非全都是非国有企业发展造成的,国有企业也难辞其咎。由于一些市场规则和法律道德规范的缺失,国有企业“费用最大化”的经营模式导致了过高的成本和低效;民营企业创新不足、缺乏社会责任;外资企业不断制造着“亏损”经营。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的综合,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数量扩张的同时没有得到同比改善。

基于此,在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应着重加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以达成高质量经

经济增长的目标。

首先,内资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亟待提高。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引起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戒备,因此其经济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必将受到遏制。目前中国很难再依靠国际资本输出的先进技术来获得跨越式发展,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实现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性转变。中国经济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主创新的平台,从短期看,这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而且从长期来看,由于没能真正做到“经济自主”^⑥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足。

其次,为了获得更加显著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政府应当着眼于制定政策来扶持本地企业,取消优惠政策,通过公平竞争促使外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转移出先进的管理经验或核心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投入,提高本地管理者对外来先进管理方法的学习能力。

再次,高质量、可持续经济增长是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实践基础。去年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单位产值能耗和两个主要污染物的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不降反升。^⑦单单从这个指标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没能得到改善,还有进一步下降趋势。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必须纳入法定的统计体系,坚决取缔那些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转移和以掠夺性开发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增长点。中国政府这种做法也许会暂时抑制中国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但对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注 释:

- ① 该文作者虽然将中国集体所有制企业也纳入到了非国有企业范畴,但这种界定并不影响其研究结论。
- ② 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变量指标本来应该用历年GDP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来替代,但中国现有的统计体系中并没有对非国有经济创造的GDP进行测算,而只有非国有的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而且非国有化程度虽然可以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度量,但1999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数据仅公布规模(500万)以上企业的数,规模以下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由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每季度进行统计,但并不公开具体数据。因此规模以下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本文采

用2004年度国家调查后公开的规模(500万)以下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指标比重作为加权测算的依据,并据此测算1999-2004年中国经济的非国有化水平。

- ③ 系本文作者前期研究成果,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经济科学》2006年第2期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一文。其中用17个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指标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做出综合评价。
- ④ “苏南模式”存在污染硬伤:http://epaper.hnby.com.cn/jrab/t20060919_664209.htm 以及孙勇杰:《苏南模式造成严重污染》,参见新京报2006年10月18日核心报道。
- ⑤ 这里主要考虑中国公布的城镇居民失业指标不能够充分反映整体经济的就业状况,而且反映经济运行的经济通涨率等指标影响因子模型的整体评价,因此未计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
- ⑥ 这里的“经济自主”是指经济系统不强调依靠外部技术引进,而主要依靠经济系统自身的技术创新机制建立起来的内涵型增长方式。
- ⑦ 具体参见毛磊、杜文娟:《聚焦环保三大热点》,人民日报2006年8月27日第2版。

参考文献:

- [1] Lin, J. Y. F. . State intervention, ownership and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R].Taipei:The 23rd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 [2] Zhang W.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the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7,(8):67-82.
- [3] Jefferson G. H., Rawski T. G., Zheng Y.. 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rends, measurement issue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6,(23):146-180.
- [4] Jefferson G. H., Rawski T.G., Wang L., Zheng Y. Ownership, productivity chang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28):786-813.
- [5] Laurenceson J., Chai J. C. H.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0,(9):21-39.
- [6] Zhang A., Zhang Y., Zhao R. Impact of ownership and competition on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29):327-346.
- [7] Carsten A. H.. Long live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flating the myth of poor financial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2,(13):493-529.

- [8] Zhang A., Zhang Y., Zhao R. Profit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measurement and ownership implication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65-88.
- [9] Wei Z., Varela O., Hassan M. K.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2,(12):61-78.
- [10] Phillips K. L., Shen K. What effect does the size of the state-owned sector have on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5,(15):1079-1102.
- [11] Dollar D. Economic reform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in China's state-owned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0,39,(1):89-105.
- [12] Gordon R. H., Li W. The change in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1983-1987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5,6,(1):5-26.
- [13] Stiglitz J.E. *Whither socialism*[M].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4.
- [14] Aivazian V.A., Ge Y., Qiu J. Can corporatiza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en without privatization [J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5,(11):791-808.
- [15] 丁冰. “非国有化”改革观试析[J]. *学术月刊*,1996,(10):50-58.
- [16] 张克难. “退出论”质疑[J].*学术月刊*,1997,(10):15-17.
- [17] 刘元春.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2001,(5):69-81.
- [18] J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ng Vecto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88,(12):231-254.
- [19] Johansen S. Identifying restrictions of linear equations with applications to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nd cointegration[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69):11-132.
- [20] Wickens R. W. Interpreting Cointegration Vectors and Commonstochastic Trend[J].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74):255-271.
- [21] 于俊艳. FDI的技术外溢性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J]. *生态经济*,2005,(10):31-34.
- [22] 袁诚,陆挺. 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05,(3):69-73.
- [23] 刘海英,赵英才,张纯洪. 人力资本“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2004,(11):19.
- [24] 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 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J]. *中国社会科学*,2005,(2):32-46.
- [25] 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给予吸收能力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05,(8):95-105.

(责任编辑:刘同清)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fluence of Non-state Economy Developmen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LIU Hai-ying, ZHANG Chun-ho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 economy in China has promoted the quantitative expans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which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reform of Non-state is not only institutionally innovative but also increment-oriented. By such a reform,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chieved a Pareto-growth without confusing the existing interests inside the system.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state economy hasn't brought in one in proportion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 China. The reasons may be as follows: private enterprises normally center on profit but neglect environment cost, and for some of them, financial difficulties may result in the degeneration of their power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Moreover, some overseas-funded enterprises can't bring in the spreading effect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 as expected, and increasing price-transferring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foreign manufacturing traders have prevented China from sharing the profits of export growth fully.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non-state economy; quality; quantity